

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综述

李 良

摘 要:四川佛教艺术发展的兴盛时期是中晚唐、五代、两宋时代。早期四川石窟、摩崖造像受北方、中原影响很大,密教的传入,密宗的流行为四川石窟造像注入了新的活力。晚唐以后,四川石窟、摩崖造像以民族化、世俗化、地方化的特色,自成一体,弥足了很多密宗造像题材,是中国石窟、摩崖造像中的奇葩。

关键词:四川早期佛像 唐代石经 密宗题材 三教造像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1)04-0049-07

四川石窟、摩崖造像数目之大,内涵之丰富,为全国盛唐以后各省石窟、摩崖造像之冠,造像开凿时代可推述汉代。据统计,全省近五十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龕在十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120多处^[1]。从四川石窟、摩崖造像风格、洞窟形制看,四川石窟、摩崖造像开凿的时代为盛唐至晚唐(广元、巴中个别洞窟造像除外),但大多数为盛唐以后遗存^[2]。

盛唐以后,正是北方中原地区石窟的开凿走向衰败的时期,而四川石窟、摩崖造像此时却异军突起,崛起于蜀中各地,历经中、晚唐、五代和两宋,四百年间昌盛不衰。而且这些石窟独具特点,以民族化、地方化、世俗化异彩纷呈,这在国内石窟、摩崖造像中是异常罕见的。就造像题材内容而言,不仅弥足了珍贵的各种密宗造像,而且有隋唐时期的佛、道造像并作;两宋时期的三教合一造像问世;四川安岳卧佛院规模巨大的唐代镌刻石经;四川仅存、时代最早的木建筑物,江油南宋“飞天藏”上雕刻的道教真人像(图一)。这些均为国内翘楚,极富特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石窟、摩崖造像是一座蕴藏丰富,尚待开启、破译的艺术宝库。

一、四川早期的佛教、摩崖造像

四川佛教造像历史非常悠久。佛教造像出现较早,令学者观注的乐山沛子湾、麻浩崖墓门楣雕刻和彭山崖墓所出明器上的早期佛像雕刻,是目前已知的少数几处汉代以来的佛教艺术遗物。我们注意到乐山麻浩崖墓门额上所刻佛像,是佛教图像与丧葬结合起来在四川崖墓的表现。该像着通肩袈裟,质感厚重,雕技粗犷,肉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一物,但已属“西国佛画”之列^[3]。由此可见,佛教及佛教艺术的输入时期其依附于“神仙方术”而传播,与中国佛教史的记述是吻合的(其背景当与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关)。崖墓这种丧葬建筑形式,是四川原住民具有地方特点的葬式。其后也为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的开凿打下了基础。著名的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年)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4],是国内着褒衣博带式服制的最早立佛和坐佛。该像雕刻较浅,立体感不强,但突出衣纹表现,具有南朝新型佛像的基本特征。1984年在成都市蒲江县龙拖湾北朝石刻造像群中,发现西凉嘉兴元年(417年)“张仁忠、许七忠”题名碑刻^[5]。嘉兴为西凉李歆年号,时当十六国末期。这就为研究四川早期造像史提供了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新线索。研究中国南朝及四川地区佛教雕刻艺术的另一批重要

实物资料,是四川省博物馆所藏成都万佛寺出土石造像。其中宋元嘉二年(425年)净土变造像为南朝纪年的最早一例。梁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世子、梁武帝孙益州刺史萧庖造释迦立像,作螺髻、通肩袈裟,为南朝后期佛像典型代表。北周天和二年(567年)的菩萨立像最具特色,该像足穿草鞋是四川造像地方化的表现。此时期造像组合复杂,题材内容多以祈求往生西方净土,雕造无量寿佛和弥勒佛,反映了江南地区的信仰流行趋向。北周以后的万佛寺造像,开始糅合北方浑厚、质朴的作风和当地的传统雕刻技法,形成一种面目圆润、造型丰腴挺秀的新风格。

万佛寺出土佛教石造像表明,四川早期地面建寺盛于开凿窟龕。而以位于金牛古道上的广元千佛岩、皇泽寺为代表。这两处石窟中的早期洞窟,与中原北魏晚期窟龕接近,说明六世纪中叶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龕像已影响四川北部造像。洞窟以佛殿窟为主,少塔庙窟。佛殿窟中主要造释迦、无量寿、弥勒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广元6世纪的窟龕造像,应受北方中原影响,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典型窟龕中的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开始流行于四川地区。8世纪以后,岷江、嘉陵江流域盛行倚坐弥勒佛、净土变和观音造像。



图一 四川江油窦岗山南宋木雕“真人”像

图二 唐代窟仿木结构的殿阁、伎乐、力士像

位于米仓古栈道上的巴中石窟,其洞窟类型、造像风格接近广元石窟,巴中石窟以南龕、西龕、北龕和水宁寺四处较重要。西龕 16 窟力士像侧有,“检得大隋大业五年(609年)造前件古像,永平三(913年)年院主僧傅芝记题记”,由此可知西龕开凿年代。虽然隋代造像目前无法确认,但我们可从研究中原北方地区佛教造像,秀骨清像模式以后的演变风格确认,隋代造像在中国石窟造像中起到了承上启下,开一代新风的作用(北齐、北周造像逐步向圆润、丰满、华丽变化,而隋代造像已具备了唐代造像的基



图三 唐代药师佛龕造像



图四 绵阳玉女泉道教造像

本风格)。其中水宁寺“药师佛”龕是它的精品,凿于盛唐。九号龕遗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墨书题记。南龕现存造像题记,如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令该造释迦佛、天宝十年(751年)造七级浮图等,都在盛唐时期。此期内龕龕多双层龕,即在方龕内凿圆拱龕,装饰繁杂的屋形龕,大多数饰以莲花、蕉叶、忍冬、卷草图案,并施以帷帐和缨络。龕左右刻有方柱,佛坛上造像,面容丰腴、体躯健壮,以及大背屏、镂空透雕等技法的运用,都是具有盛唐地方特点的雕凿手法。西龕第 35 号屋形龕中雕出仿木结构的楼台殿阁,楼阁下雕有伎乐、护法力士,生动写实,营造出净土世界歌舞升平的景象(图二),西龕与南龕均为同一时代遗物。

二、盛唐以后石窟、摩崖造像

位于四川中部的安岳石窟尤以卧佛院窟群最为精美,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卧佛院摩崖造像组合,石窟形制和造像特征如下:经文窟仅 46 号窟窟顶作人字披顶,其余皆是方形平顶。释迦、弥勒佛说法龕,为四川盛晚唐时期典型地方特征的双层龕形制,外龕方形平顶,内龕穹隆顶。说法龕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或一佛、四弟子、二菩萨、二力士,龕底部外刻博山炉,二石狮;弥勒佛一般安排在岩壁较高处。这些题材继承关系从何而来?

敦煌千佛洞石窟彩塑像中,北魏早期塑像,一般都把弥勒佛安排在中心柱,或南北壁的上层阙形龕,表示弥勒高居“兜率天宫”^[6]。重庆市大足尖山子摩崖造像,第 7 号弥勒说法龕,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为唐永徽年(650年)造,至尊安排在这些龕的最高处。而卧佛院弥勒佛龕,都高于地面 2 米以上,所以属这类造像是有其历史缘故的。

敦煌石窟隋唐时期造像定制,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或天王(金刚力士),少则三

身,多至十一身^[7]组合。

敦煌莫高窟隋、唐初造像,有平面作方形,窟内作低坛基,坛基上塑像,有窟形作方形平面,窟顶作人字披形,西壁开较深的二重褶式龕。茂汶叠溪点将台^[8]22个龕,均系双层龕,内龕为园形顶;与其相邻的重庆市大足尖山子7个龕均为双层龕,外龕平顶,内龕穹隆顶;卧佛院说法龕为双层龕,第31号龕内凿坛基,坛基上造像,由此可见,这些洞窟、龕的形制上存在共同处,也许是仿照或是相互影响。

与安岳同属四川中部的资中石窟,现存造像纪年最早者为唐贞元四年(788年),多数造像为晚唐、五代雕凿,亦有宋代造像。其中,北岩造像据《重修北岩院记》,始凿于唐建中(780—783年)年间,现存山下造像大多为晚唐作品,山上多为五代作品。西岩造像以五代为主,间有晚唐和北宋造像。东岩造像为北宋大佛。南岩造像据咸通九年(868年)题记,主要凿于晚唐。月仙洞大佛凿于晚唐,跨石岩大佛始凿于唐会昌五年(845年)九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蜀地北部石窟,特别是广元、巴中受北方中原石窟,窟形、题材影响及深,反观蜀中腹地的石窟、造像题材,则地方特点明显。据现有的实物资料,可以认知,晚唐、五代、两宋是四川石窟开凿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原北方石窟开凿已趋于衰败,四川石窟却以更成熟的民族化形式,鲜明的世俗特点,浓郁的地方气息,以独树一帜、丰富多变的题材内容,迎来了中国石窟开凿重心南移的新时期。

探讨四川石窟在晚唐、五代、两宋的崛起原因,固然与中原北方迭遭“安史之乱”、“会昌灭佛”和五代战乱有关。然而当时的蜀中政治、经济相对安定、繁荣,唐玄宗、僖宗避难入蜀,带动了大批北方文人、学士、画师和工匠南下,蜀中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加之蜀地原住民有开凿崖墓的历

史,同时密教的传入,密宗的流行和渗透,都为四川开凿石窟、摩崖造像注入新的活力。

三、四川石窟中的密宗造像

密宗,也称密教,它是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相结合的一种宗教形态,它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仪轨、俗信为其特征^[9],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早期传入中国的密教经典大多为杂密经咒,其中玄奘译有《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不空 索神咒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等。

纯正密教传来中国并形成密宗,与著名“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不空(705—774)和其弟子大力弘传的努力分不开。

密宗的法门^[10],有胎藏界、金刚界两部,胎藏界由善无畏所传。善无畏,中天竺人(印度人)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在洛阳大福先寺译出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简称《大日经》;金刚界由金刚智、不空所传,不空译《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简称《金刚顶经》,分别为胎藏、金刚两部密法的根本经典。特别是不空,师承二部密法,曾奉师命赴今斯里兰卡学习密法,携回梵本多部,居长安大兴善寺设坛灌顶,是密宗的主要创立者。

四川密宗题材造像很多,如:①如意轮观世菩萨、②毗沙门天王、③毗卢佛、④诃利帝(鬼子母)、⑤药师琉璃光佛、⑥药师三尊、⑦数珠手观世音菩萨、⑧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⑨华严三圣、⑩地藏、⑪地藏与十王、⑫药师佛与药王、药上菩萨、⑬药师与十二夜叉神将、⑭白衣观世音菩萨、⑮白衣观世音及花聚菩萨、⑯十一面观世音菩萨、⑰药师变、⑱地藏、十王与六道轮回、⑲毗卢佛与十二圆觉菩萨、⑳尊胜幢、㉑准提菩萨、㉒解冤结菩萨、㉓十圣观音、㉔大黑天神、㉕孔雀明王、㉖摩利支天女、㉗广大宝楼阁等。

以上①至⑦号为盛唐时期凿造的主要密宗

造像题材,其中药师琉璃光佛,存于四川安岳千佛寨40号窟内,唐天宝十年(751年)凿造,数珠手观世音菩萨存于安岳净慧岩15窟内,唐乾元年间(758—760年)开凿。此时期密宗造像题材、数量均较少,晚唐以后,①至②⑦题材大量出现在四川各地石窟、摩崖造像中,这与前所述四川石窟开凿在此时期内的兴盛是一致的。

在晚唐以后,密宗势力在四川占据主导地位后,原来一些显教题材也受到密宗的影响,如:药师、地藏这类题材也为密宗传教所用。唐代以来的“西方三圣”(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势至菩萨),盛唐以后,多成为阿弥陀佛、观世音、地藏的组合及地藏与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的分别组合。

佛教有显宗、密宗之分。显宗是释迦牟尼(应身佛)所说的种种经典;主张公开宣道弘法,要人悟道;主要典籍是经、律、戒、论;有行、住、坐、卧四种威仪。因而在此时期内的四川石窟、摩崖造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显教造像,在装具和装饰上,也多带有密宗造像的某些色彩,如安岳茗山寺宋代文殊菩萨立像,即戴五佛冠。许多显教造像的头光中生出“金刚佛顶印”等。同时,在盛唐、晚唐、五代、两宋时期,以上题材均有大量重复出现,为我们研究密宗造像的内涵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密宗什么时候传入四川?我们知道,密宗胎藏、金刚两部密法中,以金刚界传承较盛。日本僧人空海撰文并书的《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梨惠果和尚之碑》曰:“剑南则惟上(成都惟上),河北义圆,钦风振锡,渴法笈”。由此可见,剑南惟上受惠果亲传,若学成返川,必会在蜀地播下密宗的种子。惠果^[11](752—805),俗姓马,京兆万年县(今长安县)人,九岁从不空弟子青龙寺昙贞受学,后于青龙寺剃染,慈恩寺受戒。大历元年(766年),从不空受两部大法及传法阿黎位^[12],又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学胎藏界密法。

因此,金刚界不空之后学贯两部秘法者,只惠果一人,唐代宗、德宗、顺宗也优礼惟渥。后世称其为三朝国师。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成都府下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及敦煌五代时期的《佛说十王经》,二十几卷题有“成都府大圣慈寺沙藏川述”之语^[23]。可见,晚唐以后密宗在四川的发展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并幅射到了敦煌。

晚唐以后,推动密宗在四川发展的人物柳本尊(855—942),嘉州(今乐山)人。据《唐柳居士传》载:“蔬食布衣,律身清苦,专持大轮五部神咒^[13],盖瑜伽经中略出念诵仪^[14]也,诵数年而功成……以瑜伽经□为五部^[15],而以毗卢为本尊,位居中央”。这表明柳本尊所传为金刚界五部密法。安岳毗卢洞凿有其“十炼图”,而相邻的重庆市大足宝顶“十炼图”崖顶刻有“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小佛湾经目塔正面刻有“六代祖师^[16]传密印,可见四川安岳县及重庆市大足县是柳本尊传教的道场,当时的规模影响之大。

佛教宗派的流行与佛教经典的翻译、刻录分不开,在此我们又得谈到四川安岳卧佛院。卧佛院窟群,以形体巨大的释加牟尼涅槃像及154平方米的经文窟为主体,分段布列在北岩、南岩、月亮坪坡上,计有大小窟龕125个,其中经文窟15个,造像总计1593身,布列总长为736.3米。如此大规模凿造石像及镌刻石径,这与当时卧佛院寺院经济处于兴盛时期有关。镌刻的石经主要有《妙法莲华经五百弟子受品第七、观音普门行愿品、随喜功德品第十八、妙音菩萨品第二十四、观世音普门品》,《佛说佛名经第四》,《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佛说灌顶随愿十方净土经》,《大般涅槃经卷十五》,《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序》,《大般涅槃经高告德三菩萨品之二十三》,《摩诃般若波罗密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修多罗般若波罗密经》,《阿弥陀经》,《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大般若涅槃经卷三、四》,《大般涅槃经

圣行品之四》,《大般涅槃经刚身品第二》,《大般涅槃经如来性品第四、五、六、七、八》,《大般涅槃经卷第一》,《大般涅槃经寿命品之二、四》,《佛说父母恩重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卷第三》,《佛说禅法略出》,《禅经卷第三》,《佛说禅秘要经》,《檀三藏经》,《金光明经业藏灭品第五》,《大方便佛报恩经孝品第二、三》,《大方便佛报恩经恶友品第四》,《药师琉璃光佛功德本愿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等七十多部。以上经典为四川安岳县卧佛院盛唐镌刻,大多为显教经典,其中属于密宗或与密宗关系较深的经典,只占少数。

药师琉璃光佛及题材(图三)是四川造像常见的题材。隋代达磨笈多译《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中说:“东方净琉璃世界有佛名药师琉璃光如来,作菩萨时,曾发十二大愿^[17],解救众生。成佛后,凡敬药师佛者,可免除九横死^[18]的恶果。药师佛一般雕凿为立佛,左手托宝珠或钵,右手持锡杖,两侧立二菩萨、二力士。安岳县千佛寨存有五代药师变龕,药师佛坐于束腰莲座,身侧雕二菩提树,头上张华盖,左右立八大菩萨,龕下为十二神将,左右壁面浮雕九横死和十二愿画面。”

毗沙门天王题材盛于盛唐、晚唐和五代,均作主像供养,其形象多作戴冠,着铠甲,手托宝塔或不托宝塔,足踏夜叉。四川资中西岩碑载:“天宝初西□“犬羊之众万队”作乱,天王显圣平息;咸通年中“南蛮叛乱,围逼成都,聚十万众”,造成“府之城池将陷”的危势,幸赖天王“遽显神威”而击退。此碑立于天成四年(929年),原雕有毗沙门天王像,为我们研究晚唐、五代,蜀与境外吐蕃、南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

四、四川的道教和三教造像

四川北周以来的道教造像比较著名的有:绵阳平阳县君阙阙身上的三龕道教造像与成都西安中路窖藏出土的道教造像时代可能在萧梁至北周期间^[19],隋代的道教造像有绵阳西山观

玉女泉(图四),凿于大业三年(607年)彭县龙兴寺石刻道教像,凿于大业十一年(615年)。四川资中垮石崖、青城山天师洞、巴中南龕、北龕,安岳卧佛院、玄妙观、毗卢洞,江油窦崗山等均有晚唐、宋代道教造像。玄妙观天宝七年(748年)《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记述:“当缘法师李师李玄则”从开元18年(730年)起雕凿天龕、王宫龕、救苦天尊以及“东面真相二十龕、小龕三十二龕、天尊……天神像”。该处现存老君、真人^[20]以及释迦与老君并坐像等七十五窟。安岳县圆觉洞凿造的第39窟,是天尊、老君与释迦三铺造像共存一窟。

儒、道、释三教造像,始见于四川北宋石窟中,主要题材分别由老君、文宣王及十哲、文殊、普贤、药师佛、玉皇大帝、三身佛、地藏与十王,或释迦、香花菩萨和山王、地母组合而成。有独凿一龕,或群雕一处,正是宋代理学形成后三教合一思想在石窟艺术中的生动反映。

宋代道教造神系,形成了以三清四御^[21]系统为主、东岳世家^[22]为辅的完整格局,体现了宋代道教神系和民间信仰的基本状况。

五、结语

综观四川石窟,南传?北传?就目前根据文献及实物看,还是北传因素多一些。蜀中由川北到川中、川西,地方化、世俗化越强。越靠北,受中原影响就大。因此传统的丝绸之路是佛教及佛教艺术初传中国的道路。1至2世纪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在洛阳,渐及北方。3世纪后,佛教文化、艺术向四川、湖北、江苏等南方省扩展。当然并非否定其它传承路线的探讨,这需要继续进行大量工作。

总之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的系统研究工作较之北方、中原石窟研究起步晚,但成果不小,基本上弄清了石窟、摩崖造像的分布情况,从单纯考证题材内容转向研究洞窟形制、造像风格、题材内容、历史背景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为此认为:

除四川广元仅存有中心柱窟外,四川石窟

均为三壁凿坛设像的佛殿堂,模拟地上佛殿形制显著,晚唐、五代以后窟前建木构建筑开始流行。四川各地石窟、龕侧多雕凿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菩萨像。晚唐“华严三圣”流行,五代、北宋后常见文殊菩萨作主像,同时八部护法人形化。

安岳卧佛院雕凿巨大涅槃像和佛陀最后说法场面,翻刻“大唐东京大敬受寺释静泰撰”,《一切经论目序》,说明安岳刻经底本直接来自东都洛阳,是否与主其事者预感到佛法将遭厄运的危机感有关。“古来帝宫终煨烬……,又用金宝终被盗毁。乃顾眄山川可以终天……。”这就是开凿石窟、镌刻石经的主导思想。

巴中南龕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双头瑞佛像(释迦佛),多见敦煌壁画,资中、安岳晚唐雕造的《观天量寿经变》、《维摩诘经变》,都与同期的敦煌题材在构图布局上相同,很可能后者影响了前者。

当然在四川密宗石刻造像中,有些题材未见中原北方石窟,如十圣观音、数珠手观音、大黑天神、毗卢佛与十圆觉、孔雀明王、摩利支天女、解冤结菩萨及广大宝楼阁等。但以上这类题材却可在四川凉山博什瓦黑岩画、云南剑川石窟找到相同之处,是否与佛教艺术传播线路有关,还待探索。

注释:

[1]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存》,《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

[2]李良、邓之金《安岳卧佛院窟群总目》,《四川文物》1997年4期。

[3]温玉成:《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质疑》,《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

[4]刘志远、刘廷璧《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5]林向《蒲江龙拖湾北朝题名碑、石刻造像考察初记》,《成都文物》1986年2期。

[6][7]《敦煌彩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8]《中国石窟艺术总编》《天津教育古籍出版社》

1986版。

[9][10][11]《佛教密宗百问》李冀诚、丁明夷著《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

[12]指传授佛法导师,密教指通曼荼罗及诸尊“印明”(印契真言合称并传法授灌顶者)。

[13]即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为密宗金刚界重要经典。

[14]胎藏界佛、莲花、金刚三部,加上金刚界上宝、羯磨二部为五部;佛部以毗卢佛为部主,波罗蜜菩萨为眷属;东方金刚部以阿 佛为部主,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菩萨为属;南方宝部(灌顶部)以宝生佛为部主,四大菩萨为属;西方莲花部以阿弥陀佛为部主,四大菩萨为属,羯磨部以不空成就佛为部主,四大菩萨为属。

[15]五部神咒、指佛咒、白伞盖咒、光聚咒、高咒,胜顶轮王咒。

[16]指金刚智、不空、惠果、义操、义真、柳本尊。

[17](1)自他身光明炽盛;(2)威德巍巍开晓众生;(3)使众生饱满所欲而无乏少;(4)使一切众生安立大乘;(5)使一切众生行梵行具三聚戒;(6)使一切不具者诸根完具;(7)除一切众生众病;(8)转女成男;(9)使众生摆脱天魔外道缠缚;(10)使众生解脱恶王劫贼等横难;(11)使饥渴众生得上食之愿;(12)贫乏无衣服者得妙衣。

[18](1)得病无医死;(2)王法诛戮死;(3)鬼怪乘隙夺得精气死;(4)火焚死;(5)水溺死;(6)恶兽吞食死;(7)坠崖死;(8)中毒死;(9)饥渴死。

[19]见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出版。

[20]称“修真得道”或“成仙”之人,等级在大神之下、仙人之上。

[21]三清指王清(原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四御指紫微北极大帝、玉皇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祇。

[22]东岳世家,含东岳大帝、淑明皇后及其女儿碧霞元君、三子炳灵公夫妇等。

[23]杜斗城关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二期。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建纬)